

“垮掉的一代”与毒品

陈杰

内容提要：吸毒是“垮掉的一代”寻求极端体验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叛逆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垮掉的一代”使用毒品的动机相当复杂。他们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扩大感知范围以获取“景象”，并且把毒品视为促进写作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同时他们也是为了穷尽生命的可能性以寻找属于自己生活的目的，但有时也只是为了纯粹寻找刺激。毒品问题反映了“垮掉的一代”对主流社会的保守、压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反叛和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探索，同时也是“垮掉的一代”灵魂探索和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身体的狂欢，毒品使“垮掉的一代”摇摆于精神的渴望和本能的发泄这两极之间，揭示了“垮掉的一代”思想深处的深刻矛盾。

关键词：“垮掉的一代” 吸毒 反叛 追求 “景象”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6-0122-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规划基金(10XJA752001)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4

DOI:10.16430/j.cnki.fl.2016.06.017

Title: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Drug Abuse

Abstract: For the Beat Generation, as part of their rebellious lifestyle, doping was an extreme way to experience life in order to find the meaning that was true to themselves. It was meant to expand and sharpen perceptions in order to acquire “vision,” as well as to stimulate their writings, though, undeniably, they sometimes used drugs sheerly for sensory excitement. Drug abuse demonstrates their rebellion against the oppressiv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ir effort in self-search and spiritual que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s a kind of carnivalization, it has made the Beats oscillate between the release of physical instincts and the aspiration of spiritual quest, exposing the deeply-rooted paradoxes in their pursuit.

Keywords: Beat Generation, drug abuse, rebellion, quest, vision

Author: Chen Ji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Email: jay-chen18@163.com

“垮掉的一代”不仅是美国 20 世纪中叶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而且还是美国文学史、乃至西方文学史上最为奇特的文学流派之一。很少有哪一个作家群体像“垮掉的一代”那样,在作品中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真情实感如此袒露无遗、不加粉饰,以至于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在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保守、压抑的美国社会中,“垮掉的一代”以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反叛强权政治、物质主义以及中产阶级价值观和道德观,而且在他们叛逆的生活方式表面之下蕴含着精神追求。

“垮掉的一代”叛逆的生活方式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这种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对生活的“极端”体验之中,包括流浪、东方宗教、爵士乐、性和毒品。其中,毒品问题涉及“垮掉的一代”最惹人诟病的极端生活方式。对毒品的书写是“垮掉的一代”文学的一大特征,其代表作品如《嚎叫》(*Howl*)、《在路上》(*On the Road*)、《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都包含对吸毒场面的描写。我国第一篇以“垮掉的一代”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美国“垮掉的一代”》(载《世界文学》1960 年第 2 期,署名“戈哈”)把“垮掉的一代”定性为“腐朽”、“堕落”,直接导致“垮掉”这一带有贬义的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垮掉的一代”之所以被扣上“腐朽”和“堕落”的帽子,虽然是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毫无疑问,他们诸如吸毒和性放纵等叛逆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垮掉的一代”使用毒品的动机相当复杂。他们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扩大感知范围以获取“景象”(vision),并且把毒品视为促进写作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同时他们也是为了纯粹体验生活的目的去尝试毒品,有时也只是为了纯粹寻找刺激而吸毒。因此,着重考察一下吸毒作为“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方式的原因和目的,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一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流派,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由“垮掉的一代”催生的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毒品文化”现象。

—

为了更好地理解毒品在“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方式和文学作品中的影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毒品知识和“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使用毒品的情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毒品一般是指使人形成瘾癖的药物。根据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分类法,毒品一共分为六大类:(1)吗啡型药物(包括鸦片、吗啡、海洛因和罂粟植物等最危险的毒品);(2)可卡因和可卡叶;(3)大麻;(4)安非他明等人工合成兴奋剂;(5)安眠镇静剂(包括巴比妥药物和安眠酮);(6)精神药物(即安定类药物)。从对中枢神经的作用看,毒品可分为抑制剂、兴奋剂和致幻剂等。抑制剂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镇静和放松作用,如鸦片类。兴奋剂能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使人产生兴奋,如苯丙胺类。致幻剂能使人产生幻觉,导致自我歪曲和思维分裂,如麦司卡林。致幻剂,特别是 LSD,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才刚出现,但是到了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时期却成为了一时的风尚。

“垮掉的一代”的核心作家凯鲁亚克(Jack Kerouac)、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都有使用毒品的经历,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大量关于使用毒品的描写,而且毒品还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得力工具,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吸食毒品之后创作出来的。

在三人中间,巴勒斯可算是对毒品最有“心得”的人。他被朋友们称为“毒品鉴赏家”(Charters 154)。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十三岁开始接触毒品,1944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居住的时候就吸食海洛因上瘾,1951年搬到墨西哥城以后更是和妻子一起吸毒,1953年出版的小说《瘾君子》(*Junkie*)就记载了他自己吸毒成瘾的经历。1954年巴勒斯到了摩洛哥的丹吉尔,那里的毒品便宜且供应充足,后来他在小说《赤裸的午餐》的前言中这样描述那段时期他自己的吸毒生活:“我抽海洛因,吃它,用鼻子吸,进行皮下、血管、肌肉注射、或干脆直接塞到直肠里,针不重要了”(Burroughs xxxvii-viii)。在上瘾的日子里,“我可以连续八个小时一直盯着我的大脚趾”(xii)。后来他终于意识到吸毒的危害,决心戒毒,但总是反复,直到1956年他专程去英国接受科学的戒毒疗法,才彻底戒掉毒瘾。

凯鲁亚克也使用毒品,尤其钟爱苯丙胺和大麻。1945年底,他因过量服用苯丙胺,双腿患上血栓性静脉炎,终身未愈。1950年5月在墨西哥城,他大量使用大麻,还“偶尔尝试吗啡”,弄得自己“形容枯槁”(Charters 121)。他的“自发式写作”(spontaneous writing)是一种在“恍惚”的状态中充满激情的高速写作的方法,而要进入这种恍惚状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毒品。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吸食苯丙胺和大麻的状态中写成的。其代表作《在路上》的初稿就是在1951年4—5月间,他在服用苯丙胺的兴奋状态中一气呵成的。1953年10月,凯鲁亚克在苯丙胺的帮助下连续写作三个晚上,完成小说《地下人》(*The Subterraneans*);后来他向《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形容这次写作是“一次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举……在我完成之后……脸色苍白如纸,体重下降了十五磅,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怪怪的”。凯鲁亚克的传记作者恰特兹(Ann Charters)评论说,《在路上》有苯丙胺的紧张感觉,而《萨克斯医生》(*Doctor Sax*)则有大麻的“迷幻”色彩(159)。

金斯伯格的许多诗作也是在毒品的刺激下写成的,其著名的《祈祷》(*Kaddish*)的大部分就是在吸食大麻以后一气呵成的。而且,他一生痴迷于对“布莱克体验”(the Blake experience)的追求,尝试各种精神类药物以期进入他所谓的“最高真实”的境界(Schumacher 97)。他特别偏爱致幻剂LSD。他不仅自己使用,还不遗余力地鼓动他人使用,甚至游说国会议员放松对LSD的管制。在1966年的一场演说中,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美国所有十四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女老少,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至少去试一下LSD”(摩根120)。对于60年代“毒品文化”的兴起,金斯伯格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所有毒品中,他们三人使用最多的当属苯丙胺和大麻。苯丙胺是一种中枢兴奋药物及抗抑郁症药物,因静脉注射具有成瘾性而被列为毒品。1887年由德国科学家首先合成,1920年起被当作兴奋剂使用。凯鲁亚克等人使用的苯丙胺为片剂药物。大麻属于抑制剂,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麻醉作用,长期吸食会引起精神障碍、思维迟钝,并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由于大麻价格便宜并易于种植(巴勒斯就曾自己种大麻),它因此成为世界上吸食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毒品。

“垮掉的一代”作家和诗人服用的苯丙胺和抽吸的大麻烟成瘾性都不强,因此在他们自己眼里都算不上真正的“毒品”(junk)。所以我们看到,巴勒斯一面号称戒毒成功,一面又改抽大麻(Burroughs xxxviii)。苯丙胺属于兴奋剂,其最直接的功用就是刺激大脑神经中枢,使使用者能较长时间处于兴奋、敏锐的状态。凯鲁亚克就是借助苯丙胺使自己能够长时间保持高速写作状态。大麻则属于麻醉品。兴奋剂和麻醉剂看似药力相反,实则彼此关联。

例如大麻,它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麻醉作用,但正因为如此,吸食者会产生欣快感,有时还会出现幻觉和妄想。这个道理类似醉酒,在酒精的麻痹下醉酒之人也可能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

二

使用毒品是“垮掉的一代”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反叛手段,它表现为对生活的极端体验。

在考察“垮掉的一代”的反叛性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脱离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语境。只有在一个令人感到极端绝望的处境中,这样极端的反叛才可以获得理解。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评论诺曼·梅勒时指出:“50年代就遥远地区的专制主义而大发宏论,梅勒则看到了国内正在蔓延的专制主义。‘一种随波逐流带来的缓慢的死亡,……使一切创造和叛逆的本能遭到窒息’”(57)。“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压抑程度远远超过公共利益的需要”(72)。“垮掉的一代”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压抑和缺乏生机的时代,主流社会奉行的顺从和一致的道德准则窒息了生命,也剥夺了生存的真正意义,这迫使他们“向下”生活,在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中寻找认同,成为梅勒所谓的“白种黑人”(White Black)。于是,我们听到《在路上》的主人公萨尔(Sal Paradise)这样说:“我真希望自己是黑人;对我来说,白人世界给我的最好的东西不足以让我入迷,没有足够的生活、欢乐、刺激、黑暗、音乐和足够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Kerouac 165)。极端压制产生其极端的对应物。生活在“美国历史上压迫性最强的时期之一”(迪克斯坦 88)，“垮掉的一代”的极端行为就不仅是对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反叛,而且是对一切既定的、标准的行为模式和社会规范的反叛。“垮掉的一代”发出的“嚎叫”,“是对机械文明社会里扼杀人们精神的所有东西的嚎叫……它将人痛苦的情绪和精神的挣扎袒露无遗”(张国庆 54)。

“垮掉的一代”反叛性的独特之处,突出表现在对生活的极端体验中。这种体验反映在他们“在路上”的生活方式中,体现为与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群的认同,以及对爵士乐、性爱、毒品、东方宗教的痴迷。1952年10月16日,霍尔姆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这就是“垮掉的一代”》;这是第一篇对“垮掉的一代”进行定义和说明的重要文献,自此,作为一种地下文学的“垮掉的一代”逐渐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文中,霍尔姆斯指出,在一个价值虚无和完全看不到希望的社会和时代中,“垮掉的一代”唯有“相信自己”一条路可走。“垮掉的一代”自愿选择边缘化的、“地下人”(subterranean)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厌倦这个世界的一切形式和社会规范”,对主流社会奉行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深恶痛绝。当然,说他们是自愿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从他们希望直面自己、忠实于自我的角度来讲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是“被迫”进行这样的选择,因为正是生存危机和主流社会虚假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厌倦、疲惫、困顿、不安”,使他们感到“被驱使”、“被利用”,使他们“精疲力竭、一无所有”。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以一种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方式极端地肯定自我的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如冒险、吸毒、性放纵,既是在一个找不到生存意义的社会中对自我存在的极端肯定,又是对令人厌恶的虚伪价值观的反叛(Holmes 3-6)。

吸毒就是“垮掉的一代”生活方式中的极端举措之一,我们以巴勒斯——即《在路上》中老布尔(Old Bull Lee)的原型——为例加以说明。

巴勒斯曾说,他吸食毒品是因为感到厌倦,他不愿意过“哈佛为你设计好的那种生活”(Charters 56)。巴勒斯的“厌倦”,不是对于生活本身的厌倦,而是对于主流社会为他“设计好的那种生活”感到厌倦,他宁愿自己去探索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愿去走别人为他指定的人生之路。因此,我们看到《在路上》这样描述老布尔:“他是一个教师,可以说他最有资格当教师,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他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称作‘生活的事实’。他的学习不仅出于必须,而且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获得经验。如今,他最后的研究课题是吸毒”(Kerouac 129-30)。为了探索适合自己的路,就必须首先去体验生活,特别是去体验那种未知的、非主流的生活。既然主流社会指定的生活道路行不通或者不可行,那么就必须去尝试那些社会下层人、边缘人的生活方式,从中发现生活的真谛。而且,生活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只有对生活进行极端化的体验才有可能穷尽和洞悉各种可能性。“垮掉的一代”混迹于纽约时代广场和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酒吧,与嬉普斯特(hipsters)打成一片,就是追求这种体验的表现。他们颠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常常是以一种“非道德”的眼光,也就是摆脱了主流社会道德观束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在小说中,老布尔在家中挂了一幅很难看的画,朋友问他:“你为什么要在那里挂这么难看的东西?”布尔却说:“我喜欢它就因为它丑。”他整个的生活都是如此”(130)。我们知道,美丑是审美的范畴,任何对美或丑的评价都是一个审美判断。老布尔颠倒常人眼中的美丑标准,表明了他对这个社会奉行的审美标准的颠覆。关键是,“他整个的生活都是如此”;换言之,他不仅颠覆社会的审美准则,而且颠覆其他一切准则,当然也包括对有关善恶的道德准则的颠覆。因此,在主流社会眼中是丑恶的东西,如毒品和同性恋,他就偏要去尝试、去体验。这就是“垮掉的一代”寻求极端体验的逻辑之一,表现为对主流社会的反叛和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探索。

三

使用毒品是“垮掉的一代”灵魂探索和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它突出表现为对“景象”的追求。

如果我们在“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方式中仅仅看到反叛,那就大谬不然了。霍尔姆斯在《这就是“垮掉的一代”》中指出,“垮掉的一代”的极端举措是“被信仰的渴望驱动的”;他写道:“关注信仰的失落是‘迷惘的一代’的特征,对于信仰的渴求才是‘垮掉的一代’的特征”(5)。“垮掉的一代”极端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流浪、吸毒、性放纵,还是佛教和禅宗,都不仅是一种反叛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追求的表现。这似乎自相矛盾,就像在“垮掉”(beat)一词的含义中,“至福”(beatific)与“落魄”(beat down)看上去自相矛盾一样;然而,正是在对生活极端的体验中,我们看到了“垮掉的一代”在虚无中探索真理和追求信仰的勇气。试比较以下两段文字:

空间感觉和时间感觉已经变化了:异常遥远之物被一览无余,几乎是可感知的了……视野的扩展,涵摄更大的数量和广度……器官的精细化,使之能够感知大量极其细微的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尼采 1024)

第二天,我所做过的、知道的、读过的、听过的和揣测过的一切又重新涌入我的脑海,并且以一种全新的符合逻辑的方式重新组合,因为除了感到惊奇和感激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只能不住地说着“好,好”……这些大麻引起的幻觉一直持续到第三天。到那时,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的全部生活也变得清晰了。(Kerouac 167)

如果不加说明,恐怕许多人会误以为这两段文字都是对吸毒感受的描写。的确,这两种状态非常相似。事实上,第一段引文描写的不是使用毒品以后进入的状态,而是尼采对狄奥尼索斯酒神状态的描述,而第二段才是小说《在路上》中迪恩(Dean Moriarty)描述的大麻产生的“景象”。两者的共同特征是,感知范围获得超乎寻常的扩大和延伸。它使人感到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力,感到自己就是生命的主宰,从而沉浸在狂喜和极乐之中。凯鲁亚克曾对金斯伯格说,苯丙胺强化了他的意识,使他感觉自己更聪明了(Charters 59)。而在尼采看来,狄奥尼索斯精神是对生命的肯定。难怪凯鲁亚克把他笔下人物迪恩的原型、现实生活中充盈生命活力的卡萨迪(Neal Cassady)视作狄奥尼索斯的化身,称之为“尼采式的英雄”(Charters 68)。“垮掉的一代”对灵魂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宗教启示式的狂喜状态的追求。

凯鲁亚克曾说:“垮掉的一代根本上是宗教的一代”(Tonkinson 6)。我们知道,“垮掉”一词的含义之一就是“至福”。所谓“至福”,或称“真福直观”(beatific vision),作为天主教用语,指对上帝的直接认知。凯鲁亚克用“至福”来指代“垮掉的一代”的精神追求。“景象”(vision)一词原本指“视觉”,在“垮掉的一代”这里指的是一种扩大的或强化的意识或感知,根据上下文可译为“景象”、“幻象”、“幻觉”、“视野”等。需要注意的是,“景象”这个词在英文中并没有任何“虚幻”的意思,产生这种“视觉”的人(通常是在宗教体验中)也决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幻觉”或者“幻象”。略微研究一下 vision 的词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景象”在“垮掉的一代”文学中的深刻含义。Vision 这一英文名词源自拉丁文中的动词 *vedeo*,意为“看见”。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可以在同属印欧语系的梵文中发现 *vidya*,而在希腊文中与之对应的词则是 *idea*。*Idea*(“理念、理式”)一词在柏拉图哲学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看来,vision 一词就不单单具有“看见”的含义,它还“与”知识”、“真理”、“智慧”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内视”或“洞见”(insight)。正因如此,“垮掉的一代”认为,“景象”是真实的,甚至比平常所见的现实更为真实。处于这样一种意识状态之中的人能够“看见”超越时空的人与事物,在短时间中产生一种物理时间停顿、物理空间消失的感觉,头脑中出现一种超验的景象。在刹那间,时空倒转,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消弥,顿然产生当下即是永恒的感知;他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一个部分,从而产生一种“狂喜”、“极乐”、或称“心醉神迷”(ecstasy)的状态。

“垮掉的一代”对这种超现实的、宗教启示式的“景象”的追求,最早见于金斯伯格的“布莱克体验”。1948年夏,金斯伯格在纽约哈莱姆的公寓里读着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啊,向日葵》,突然间他仿佛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吟诵这首诗。在恍惚中,他看见布莱克穿越时空的界限向他说话,而他则变成了向日葵,在遥远的天际他看到了上帝:“我感觉整个宇宙成了充满了光、天使、交流和信息的诗,我的头顶好像被炸开,让整个宇宙的一切同我的头脑联系起来”(Turner 95)。后来,他又几次看到类似的“景象”,看见布莱克

在吟诵《病玫瑰》和《迷路的小女孩》。金斯伯格十分看重“布莱克体验”，他坚持认为“布莱克体验”是他“曾经有过的唯一真实的经历，就像我所有的感官被完全吸收、合并而形成的一种绝对真实的东西”(Caveney 55)。不仅如此，他把这种“景象”和人生的终极意义联系起来。他说：“不管怎样，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这是我为之而生的东西，第二感觉是，永远不要忘记——永不忘记，永不拒绝，永不否认”(Hyde 123)。在金斯伯格看来，这是一种“最高真实”，他称之为“新视野”(New Vision; Schumacher 97)。这个词成为金斯伯格所追求的一种艺术思想和文学视野的代名词，也成为40年代中期兴起的“垮掉的一代”的“新意识”。金斯伯格从此相信，诗人的意识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达到永恒，诗歌是表现“景象”的最佳工具，从而成为传递永恒的声音，具有预言似的、启示录式的作用。为了获得这种“景象”，金斯伯格多方尝试，包括使用各种精神药物(其中大部分都可列入毒品类)，以期重获那种心醉神迷的感觉。他还写下了多首诗来描述这种奇妙的体验，包括《读威廉·布莱克的〈病玫瑰〉》、《一只特别的鸽子》、《西部民谣》、《岩石之声》、《我们彼此了解吗？》。

不仅是金斯伯格痴迷于“景象”，在凯鲁亚克小说中我们看到，佛教、爵士乐、性与毒品都成为“垮掉的一代”获得“景象”的手段和方式。《在路上》中的迪恩在博普爵士乐(bop jazz)、性以及毒品的作用下都曾到达这种“狂喜”的状态，《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中的雷·史密斯(Ray Smith)在佛教修习中进入到“极乐”的境界。凯鲁亚克曾经把佛教的极乐状态同毒品相提并论。在一首题为《如何打坐》的诗的开篇，他写道：“——灯灭了——/双手合十，瞬间进入/极乐，如一剂海洛因或吗啡……”(Tonkinson 29)。

在毒品等极端体验营造出来的“景象”中，“垮掉的一代”孜孜以求的“它”(IT)得以显现。《在路上》中迪恩和萨尔寻找的“它”是什么？这是凯鲁亚克生前经常被记者问到的一个问题。对此，他给出一个让记者和一般读者感到莫测高深的回答：“我在等上帝显露真容。我要上帝露脸”(Charters 298)。在“景象”中“上帝”被直接感知，永恒被直觉体验。在宗教的含义上，“上帝显露真容”就是“显灵”；在认识论意义上，“上帝”则代表最高的真实和永恒的价值。因此，正如凯鲁亚克笔下主人公萨尔·帕拉迪斯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Paradise意为“天堂”)，“垮掉的一代”的“寻找”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超越，那个神秘的、带着神性的永恒光芒的“它”，就是生命的永恒意识，这也正是“垮掉的一代”真正追求的东西。“它”令抓住它的人陷入狂喜，因为它使看似短暂、无常的生命获得了圆满和永恒，因而也为这虚无的人生提供了意义。毋庸讳言，这接近于一种宗教式的感悟。“它”无法诉诸理性，只能在某些极端的情景下才能出现，而且可遇而不可求。但无论如何，“它”的获得都需要对生活的激情体验，只有不断上路，疯狂地触及各种可能性才有可能达到“IT”。这也正是“垮掉的一代”寻求极端体验的逻辑之二：对“景象”的追求。

四

我们应该看到，“垮掉的一代”作家对毒品的使用和描写首先是他们“自白”(confession)的一个内容，是他们灵魂袒露的表现。我们决不能用一种超越时代和社会具体语境的道德眼光孤立地看待“垮掉的一代”在生活方式上的极端举措。他们尝试各种极端体验，是因为他们在既有的生活方式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有价值的生活。所以，这样的

“寻找”必定是在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反叛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背弃主流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垮掉的一代”的追求首先体现在他们叛逆的生活方式中。这种追求是在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反叛中实现的，它采取了被主流社会视为极端的方式，如爵士乐、东方宗教、性与毒品等等，它在本质上是对极端压抑人性的主流社会道德观的极端反叛。

更为重要的是，在“垮掉的一代”吸毒等极端生活体验背后，有着不容忽视的精神指向。“垮掉的一代”的“寻找”是对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发掘和创造，也就是一种精神追求。“垮掉的一代”在与主流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的决裂中，致力于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致力于从各种极端的生活体验中探索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去发现生命的永恒意义，以获得个体存在的超越性。他们精神追求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景象”中。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由毒品引发的“景象”是不能持久的，那种狂喜也注定是短暂的。正如大麻可以产生兴奋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沮丧一样，“景象”带来的狂喜将很快被随之而来的失落所替代。毕竟，这种“景象”是借助于外物获得的，它是被动的，缺少了自觉和认知的深度。而且，“景象”在营造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

当我们强调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孤立地看待“垮掉的一代”吸毒问题的同时，我们也绝非是要美化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垮掉的一代”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地下文学”，即迪克斯坦所称的20世纪50年代的“地下反文化”⁽⁵⁾，不论是其作家和诗人的生活态度、行为举止，还是其文学作品的主题与风格，都有一种强烈的实验性和极端性。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尤其表现在他们诸如吸毒和性放纵等极端生活方式方面。毒品，如同性一样，作为一种身体的狂欢，使“垮掉的一代”摇摆于本能的发泄和精神的渴望这两极之间，揭示了“垮掉的一代”思想深处的深刻矛盾。我们必须记住：毒品既是兴奋剂又是麻醉剂。

当我们研究“垮掉的一代”的吸毒问题时，既不能像有些研究者那样不假思索地斥之为“堕落”，也不能像商业文化催生出来的赶时髦的伪嬉皮士那样竞相模仿。“垮掉的一代”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成为一种“现象”被主流媒体批判、被商业文化炒作、被叛逆青年跟风，从而成为60年代中后期青年反文化运动“毒品文化”的滥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凯鲁亚克因1957年《在路上》出版而一夜成名之后，次年应出版社要求写作并发表了应景之作《达摩流浪者》，小说封面上的介绍词就称作者凯鲁亚克是“开创嬉皮世界的人，迷幻的一代之父”。虽然青年反文化运动在揭露时弊、解放思想等诸多方面不失积极意义，但其中看重叛逆的标榜式“标签”多于实质性的精神追求，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说“垮掉的一代”具有反叛和“寻找”两大主题，而且反叛作为手段应该服务于精神追求的目的的话，那么他们通过吸毒等极端生活方式传递给60年代美国青年的，则更多是为反叛而反叛，而且这样的反叛还主要是以逃避和玩世不恭为主要形式的。正如王恩铭所言，在青年反文化运动中，“吸食毒品，特别是大麻，成为美国青年反叛主流社会的一种标志”⁽¹⁰³⁾，“这可以说是嬉皮士逃避或者抵抗现实世界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武器”⁽¹⁰⁶⁾。“开心好玩是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¹¹⁵⁾。肉体的反叛多于精神的追求，直面虚无的勇气被寻求感官刺激所取代。在某种程度上，“垮掉的一代”的精神追求已然蜕变成为一种标签和现象。

“垮掉现象”是表面的、肤浅的，它从根本上割裂了“垮掉的一代”文学的底蕴和精神。当“垮掉的一代”被当作一种“现象”来接受、效仿，以至于成为一种风气和时尚的时候，它就偏离了“垮掉的一代”文学蕴藏的内在精神。“现象”注定不能永恒，仅能昙花一现。津津乐道于“垮掉现象”所展现的生活方式，除了满足好奇心和偷窥癖以外，别无意义。而且，毒品也不能像金斯伯格所鼓吹的那样带来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非但没有像 LSD 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帮助人们从‘一个思想封闭的制度和意志强加于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相反，它使众多本应是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终日沉湎于毒品制造出来的迷幻世界中，精神低迷，意志消沉，无精打采，毫无任何生气”（121）。在 60 年代被主流媒体和商业文化奉为“垮掉的一代”代言人的凯鲁亚克，当被记者问及毒品问题时，他不无清醒地说，那只是一时流行的东西，和浴缸杜松子酒差不多，“毒品产生的东西终会消失的”（Charters 299）。当大麻成为一种成瘾的习惯，像抽烟和酗酒一样，尤其是当它竟然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再要从中寻找意义，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Burroughs, William. *Naked Lunch*. New York: Grove, 1966.
- Caveney, Graham. *Screaming with Joy: The Life of Allen Ginsberg*. New York: Broadway, 1999.
- Charters, Ann. *Kerouac: A Biography*. New York: Warner, 1974.
- Holmes, John Clellon. "This is the Beat Generation." *The Beat Generation: A Gale Critical Companion*. Ed. Lynn M. Zott. Vol. 1. Detroit: Gale, 2003. 3-6.
- Hyde, Lewis, ed. *On the Poetry of Allen Ginsberg*. Ann Arbor: Michigan UP, 1985.
- Kerouac, Jack. *On the Road*. New York: Penguin, 2000.
- Schumacher, Michael. *Dharma Lion: A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 Tonkinson, Carole, ed. *Big Sky Mind: Buddhism and the Beat Generation*. New York: Riverhead, 1995.
- Turner, Steve. *Angelheaded Hipster: A Life of Jack Kerouac*. New York: Viking, 1996.
- 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Dickstein, Morris. *Gates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 Trans. Fang Xiaoguang. Nanjing: Yilin, 2007.]
- 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Morgan, Bill. *Allen Ginsberg: Selected Essays (1952-1955)*. Trans. Wen Chu'an, et al.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2005.]
- 尼采:《权力意志——1885—1889年遗稿(下)》,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 [Nietzsche, Friedrich. *der Wille zur Macht (II)*.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Commercial, 2007.]
- 王恩铭:《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Wang, Enming. *The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of the 1960s: A Study of the Hippie Culture in the USA*. Beijing: Peking UP, 2008.]
- 张国庆:《“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Zhang, Guoqing.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uhan: Wuhan UP, 2006.]